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10

2007年2月14日

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研究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 王建

自 1978 年至今，中國的對外開放已經經歷了 28 個年頭。由於實行了正確的開放戰略，對外開放成為推動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機制和動力，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的內部與外部都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點和變化，對對外開放也提出了新要求，這些都需要我們對已經推行了近 30 年的開放戰略進行必要的調整，以適應新時期的新要求。本研究報告是為到 2030 年中國新對外開放戰略的設計，勾畫出一個框架性的思路。

一、對以往對外開放戰略的評價

改革、開放和發展是中國 28 年來的三大主題，在已經過去的 28 年中，對外開放既是推動改革的基本動力，也是解決經濟發展

矛盾的基本手段。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在體制方面面臨的巨大矛盾，是如何使已經持續了 30 年的傳統體制順利轉軌。由於傳統體制在意識形態方面擁有強大勢力，以及長期“條塊分割”所形成的部門與地方的獨立利益，使中國在引入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中，經常面臨著重重阻力，而中國通過持續擴大的對外開放，使經濟發展不斷與國際的市場經濟體制接軌，迫使傳統體制所把持的領域不斷受到外部市場經濟體制的衝擊和壓縮，從而使對外開放成為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的基本動力源。到目前為止，中國以市場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可以說已經基本上完成了，而沒有對外開放的促進，改革的成功是不可想像的。

從發展方面看，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二元”結構所帶來的經濟發展障礙。在建國後長達 30 年的經濟發展中，中國由於採取了軍重工業超前發展的特殊工業化戰略，導致大量工業企業長期缺乏技術改造與更新，技術設備嚴重落後，而長期城鄉分割的工業化政策，又導致在農村內部積聚了巨大的剩餘勞動力，按照庫茲涅茨等人的分析，在 20 世紀 80 年代的所有發展中國家中，非農業部門與農業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距，最大為 3.2 倍，而 1978 年時中國為 5.19 倍。1978 年中國製造業工人平均擁有的固定資本已經達到了人均 3000 美元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但農業勞動力所佔比重卻高達 78%，是典型的人均收入 200 美元以下國家的水平。在國內資本積累能力極度有限的條件下，如何兼顧城市大工業技術基礎的改造與昇級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

1978 年以來，中國的對外開放及時抓住了 80 年代以來世界產業結構調整和東亞發達經濟體產業昇級的機會，大量吸引國際投

資，充分發揮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大力促進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創匯，大量吸收了農村剩餘勞動力，也為中國的工業結構昇級創造了條件。在過去的 28 年，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累計創匯約 1.5 億美元，吸引國際直接投資近 1.3 萬億美元，進口機電設備約 3.6 萬億美元，使中國的“二元”結構矛盾大為緩解，也極大地提昇了國力，從而使中國經濟創造出連續 28 年平均 9.6% 高增長的世界奇蹟，若沒有對外開放，這個世界奇蹟也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

二、新時期中國發展與體制的新特點 與對外開放的新要求

從改革開放初期到 20 世紀 90 年代初期，就工業增長結構看“輕型化”的特徵極為明顯。1978 年，中國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出的比重為 57.8%，1991 年下降到 51.1%。這種變化的原因，是中國居民的收入與消費水平在這一時期還處在以吃、穿為主的消費階段，而政府通過調整發展戰略取向，主動降低了積累水平，使中國的工業結構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在整個 90 年代，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中國居民的消費結構處在等待向住、行方向昇級的階段，一方面表現為自 90 年代初以來居民儲蓄率與國民總儲蓄率顯著提昇，一方面表現為在等待消費結構昇級的過程中由於缺乏新的消費熱點，消費市場增長和工業產出結構的變化都相對 80 年代要緩慢得多。從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出中的比重變化看，到 2001 年上昇到 60.6%，十年間上昇了不到十個百分點。

從 2002 年開始，中國居民、特別是城市居民消費結構明顯表現出昇級性變化，住宅和汽車成為新的耐用消費品開始進入家庭，

由此帶動了自 2003 年開始的新的經濟增長高峰。由於住宅與汽車消費主要依靠重工業支撐，導致重工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迅速上昇，由此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進入到了以重化工業為主導的新階段。2006 年重工業比重已經上昇到 70%，比 2002 年提昇了 7.4 個百分點，年均重工業比重上昇也超過了兩個百分點。從各國工業化的歷史經驗看，到工業化基本完成期，重工業的比重一般都會上昇到佔工業總產出四分之三的水平，也就是說，在未來 20 多年內，中國的重工業比重還會繼續上昇。

從資源需求看，重工業與輕工業最大的不同是，輕工業是以地表以上的農業資源為主要原材料，而重工業是以地表以下的能源和礦產資源為主要原材料，因此工業化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工業化發展對資源的需求指向，就從地表以上轉到地表以下。但是中國雖然國土遼闊，地表以下的資源蘊藏量卻並不豐富，例如中國的國土面積雖然佔世界陸地面積的 7%，石油蘊藏量卻祇佔 3%，以資源蘊藏比重與人口比重比較相差就更大，中國以人均計算的主要能源和礦產資源，除了煤炭以外都排在世界 80 位以後，這樣就使中國在進入重化工業增長階段後，不可能立足於本國資源來支持中國的重工業化進程，而是面臨著日趨尖銳的資源短缺矛盾，也使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最近在一篇文章則指出，中國在 2005 年全球工業原材料用量增長中所佔的比重是：鋁 50%、鐵礦石 84%、鋼材 108%、水泥 115%、鋅 120%、銅 307%、而鎳更遠超越 307% 的增長水平。從近三年看，也有相關報道說明，中國進口的鐵礦石已經在世界鐵礦石貿易佔有 40% 的比重，在世界新增原油出口中也佔有 40% 的比重，而在世界能源與礦產品貿易中，中國已經佔有 20% 份額了。

東亞地區的日本和“亞洲四小”與中國大陸的資源稟賦條件

極為接近，因此也都採取了與中國極為類似的經濟發展模式，就是充分利用勞動力豐富的優勢，發展輕重製造業產品的出口，並從國際市場大量換取資源。以日本來說，在基本上完成工業化的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初級產品進口在全部進口中所佔的比重就超過了 75%，並且長期維持在這個水平，從人均初級產品進口看，則超過了 1000 美元。雖然自 70 年代以來由於科技進步，生產單位物質產品的能耗與材料消耗減少了許多，有利於減少資源進口金額，但是自 21 世紀以來由於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速度加快，引起世界能源與礦產品的價格迅猛上漲，從石油價格看，以現價美元計算的單價已經比 80 年代初期上漲了近 50%，鐵礦石價格上漲了兩倍以上，金屬銅價格上漲了三倍以上。由於在未來初級產品價格是上漲趨勢，到 2030 年中國基本完成工業化的時候，人均所需進口的初級產品金額恐怕要增加到 1500 美元，以 15 億人口計算就是 2.25 萬億美元，如果初級產品進口比重也在 75% 左右，則總進口可能超過三萬億美元。為了進口就必須出口，如果到 2030 年中國的出口也超過三萬億美元，則中國的貿易總額就要超過六萬億美元。

1992 年中國出現糧食淨進口，1993 年出現了石油淨進口，1995 年出現了初級產品淨進口，這一系列的變化已經預示著資源矛盾將逐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制約，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直到 90 年代中期，一方面由於中國工業化階段的基本特徵還是處在“輕型化”階段，一方面由於經濟規模相對比較小，以國內的能源與礦產資源產出還能夠滿足國內的需求，因此工業化資源匱乏的壓力還不突出，但是到 21 世紀中國出現進入重化工業發展階段的顯著特徵後，國內資源產出就越來越不能適應國內迅速增長的需求了。從初級產品淨進口看，1995 年祇有 29.3 億美元，2002 年增加到 207.3 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 32.2%，而 2003~2005 這三年間的年均增長

率猛增到 68.2%，增長率提昇了一倍還多。近年來中國初級產品的出口處在停滯狀態，而進口迅猛增長，如果到 2030 年初級產品進口額達到 2.25 萬億美元，則未來 25 年初級產品進口額還得增長 15 倍以上。

這就給中國的對外開放提出了新要求。如果說自改革開放以來到 20 世紀末 20 多年內，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解決城市大工業昇級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所面臨的資金不足問題，那麼今天由於中國的銀行“存差”已經超過了 11 萬億元、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一萬億美元，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了，經濟發展對對外開放提出的新要求是，必須通過不斷擴大的對外貿易，保證中國工業化所需主要初級產品資源的獲取，這就是中國對外開放新戰略的要點之一。

到目前為止，中國通過 28 年持續的改革，已經基本上奠定了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隨著經濟體制的成功轉軌，分配體制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按勞分配體制，開始向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按要素分配體制過渡。收入分配體制的變化使中國的經濟運行特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從成功的一面看，是通過打破傳統的平均主義“大鍋飯”，充分釋放了財富創造的動力源泉，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經濟在微觀層面的運行效率，使中國徹底擺脫了“短缺”經濟特徵，帶來的新矛盾則是由收入差距拉大所導致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與生產過剩傾向。根據有關方面統計，以“基尼”係數衡量的收入分配差距，1978 年為 0.23，1990 年為 0.28，但是到 1996 年就急劇上昇到 0.40，目前則已上昇到 0.465，已經超過了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一般水平，進入到收入分配極度不平均的狀態。

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與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都使中國的儲蓄水平與投資能力明顯上昇，但是卻使居民主體的收入水平不能與經濟增長水平同步提昇，從而在國民經濟總量循環中形成了巨大障

礙，這個矛盾在目前集中表現為生產過剩的領域不斷擴大。在 90 年代中期，消費品生產普遍過剩的矛盾就已經開始顯露，在本輪經濟增長週期中則主要表現在生產資料領域。例如根據測算，到 2010 年中國的鋼鐵生產能力可能會增長到超過六億噸，汽車生產能力可能達到兩千萬臺，發電能力則可能增加到九萬億千瓦，與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比較，都是太高了。

最近有關中國分配問題的研究成果說明，目前中國 20% 的富裕人群大約佔有了 60% 的社會財富，這與典型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相比並不特別高，例如根據 2006 年 3 月美聯儲最新的報告，2005 年美國 10% 的富人就佔有了全美近 70% 的社會財富，但美國的基尼係數卻低於中國。導致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在按要素分配體制下，保障社會公平的主要機制，是國家必須通過建立轉移支付制度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而中國在打破傳統體制後，卻沒有馬上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完善的社會轉移支付制度。以養老保障體制來說，根據勞動部的最新報告，到 2005 年祇有 1.75 億城市人口和五千萬農村人口加入了社會養老保障體系，這部分人口在全社會 7.5 億勞動力中僅佔 30%，在農村還不到 13%，在城市也沒有過半，其他如醫療和失業保險的社會覆蓋率更低。

另一個重要原因還是由於中國的“二元”結構，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例如日本和韓國在工業化高峰期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時候，城市人口收入也僅比農村高出 60~70%，而中國目前則高達 3.3 倍。此外，世界處在人均 1500 美元階段的國家，城市化率一般都在 55% 左右，日本和“亞洲四小”則超過 75%，但是直到 2005 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剛剛超過 40%。由於農村低收入的人口比重過於龐大，不僅導致居民收入差距過大，也成為擴大國內消費的沉重壓力，2005 年佔人口 60% 左右的農村居民所購買的商品，在全社會

消費品零售額中的比重還不到三分之一。

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轉移支付體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涉及到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以及財政體制和社會征信制度等方方面面的體制與關係，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而徹底打破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則需要中國城市化的巨大推進，需要更長時間，因此基本理順中國的收入分配關係至少需要8~10年時間，而從中期階段看，至少在“十一五”時期內，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呈縮小趨勢，而是會繼續拉大。

但是到目前為止，本輪投資週期已經接近尾聲，2006年前期建設的生產能力已經開始釋放，到“十一五”中期，還會有更多的生產能力集中釋放，從而將使中國經濟面臨著現實的生產過剩矛盾威脅。如果由於各種長期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從而導致內需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可能顯著提昇，則中國要想保持經濟增長的平穩與連續性，祇能依靠外需的擴大，就是增加貿易順差。“九五”時期到“十五”前四年，中國淨出口在總需求中的比重基本穩定在2~2.5%之間，2005年已經提昇到4.5%，2006年的貿易順差增加到1775億美元，淨出口比重進一步上昇到7%，“十一五”後期則可能超過10%，順差額則可能超越3000億美元。

所以，擴大出口以保持中國的需求增長，就成為至少在未來十年內中國經濟發展對對外開放提出的新的戰略性要求，因為祇有如此，才能給中國理順國內的體制關係留下足夠的空間與時間。

三、中國對外開放新戰略的全球化背景

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新經濟體制所面臨的矛盾，都需要中國從更大程度的對外開放當中尋求解決途徑，但中國是否可以成功地擴大

利用國際市場與資源的規模，不能祇是中國一廂情願，還要看是否具備必要的國際條件，要看在未來 25 年內世界是否可能給中國提供高達六萬億美元的貿易空間，這就要對目前以及未來國際環境的大趨勢進行研究與判斷。

“冷戰”結束後，世界進入了新的全球化時代，也產生了所謂“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這種失衡的主要標誌，就是美國日益擴大的經常項逆差，有可能引發美元崩潰和全球金融體系的劇烈動蕩。然而從另一方面看，全球經濟失衡，是被一種新的全球經濟均衡關係所代替的，這就是美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逆差對應於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順差，美國日益擴大的負儲蓄對應於東亞和中國日益擴大的淨儲蓄，美國的需求增長對應於東亞與中國的供給增長。

這種新全球化格局的出現，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呈相互隔絕的經濟發展格局，在發達國家間由於經濟發展水平接近，因此出現了基於規模經濟的產業內部的水平分工體系，而大量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無法融入這一體系中。此外，由於冷戰時代東西方的對立，而“南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與“東方”國家靠近，限制了發達國家的產業投資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由此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分工圈”和“垂直分工圈”，即發達國家間僅在彼此之間進行工業製成品的投資和貿易，對發展中國家僅進行工業製成品與初級產品的交換，這樣就導致在南、北國家間經濟發展水平的鴻溝越來越寬。

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也表現為各類生產要素的價格差距。由於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生產要素的價格也隨之提高了，比如以美國與中國比較，可用於工業化發展的耕地資源按人均

計算，是中國的 25 倍以上，但直到今天美國的城市地價平均約為每平方米 500 美元，中國則僅為 1200 元人民幣，相差三倍以上。按理說稀缺的資源應該價格高，但中國的地價卻比美國低得多，就是因為中美在二戰後長期內由於經濟發展隔絕，形成了高低懸殊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價格差距。反觀與美國同處於市場經濟體系內的日本，在基本實現工業化的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城市地價水平就上昇到每平方米六千美元，是美國地價水平的 12 倍，就是日本土地要素稀缺在價格體系中的正常反映。

冷戰結束後，由於原東方國家紛紛轉入市場經濟體系，長期橫互在南北國家之間的經濟藩籬終於被打破，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巨大的生產要素價格差，也立即展現在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面前。由資本追逐利潤的強烈動機所驅動，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開始了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流動的新潮流，由此形成了目前所說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戰後至 80 年代末，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間流動，但 2004 年發展中國家吸收的跨國直接投資比重，已經從 90 年代初期的 20% 猛增到 46%，當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則猛增了 48%。據世界銀行剛剛發表的 2005 年全球金融報告，2005 年從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的私人資本達到了前所未有的 4910 億美元，比上年猛增了 63%，說明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在持續了十多年後，仍在形成更大的浪潮。

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使國內的商品生產迅速減少，必然會形成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在新全球化浪潮中美國走得最快，貿易逆差的擴展速度也就最快。2005 年美國的經常項逆差已經接近 GDP 的 7%，2006 年則肯定要超過 7%。目前美國進口的物質產品，已經相當於國內物質產品消費的 40%。不僅美國是如此，歐洲也是如此，2003 年歐洲與東亞地區的貿易逆差已經超過了 1000 億歐元，2005

年根據歐盟統計，歐盟對華貿易逆差已達 1060 億美元。同年 11、12 月歐元區連續出現貿易逆差，2006 年前 11 個月累計則出現了 151 億歐元的逆差，2006 年出現歐元區的第一次全年逆差已成定局。

由於在戰後 50 年的長期過程中，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形成了幾十倍的生產要素價格差，使傳統的通過匯率來調整貿易平衡的機制完全失效了，因為對貿易雙方來說，匯率調整一般祇能使貿易雙方的相對價格水平在百分之幾十的範圍內變動，而由生產要素價格差距所決定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商品價格差距卻高達百分之幾千，這樣匯率變動幅度如果不足 10%，對生產要素價格差距的影響還不足 0.1%，超過 10% 也不足 1%，所以想要通過匯率調整來糾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不平衡狀態，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個實例是 2005 年 7 月中國政府在美國政府的強烈要求下調整了匯率政策，到 2006 年末人民幣已經對美元累計升值了 7%，但 2006 年前 11 個月與 2005 年同期相比，中方對美貿易順差仍擴大了 271 億美元。

按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差距有 30 倍計算，即使在未來 25 年使人民幣從目前對美元的 8 比 1 升值到 2.7 比 1，即升值三倍，把這些差距縮小到十倍以內也要超過 20 年。以工資為例，目前中國的實際工資增長率大約為 6%，發達國家大約為 3%，如果未來都以這個水平增長，要一百年才能拉平，加入人民幣升值三倍因素，到 2030 年仍會相差十倍。從日元升值的經驗看，是在基本上完成工業化後才開始升值，而且在初始階段升值的幅度也不大，祇是在完成工業化十年後才開始大幅度升值，所以預計未來 25 年人民幣升值三倍，已經是十分大膽的設想了。如果在未來 20 多年內中國仍可以保持住對發達國家極其明顯的產業競爭優勢，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產業轉移就不會停頓，中國對發達國家貿易順差的

擴大也遠沒有到達頂峰。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消費類產品已經基本覆蓋了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市場，但是消費類產業僅佔發達國家製造業三分之一的比重，而佔三分之二的重型製造業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轉移。隨著中國重化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工業技術基礎不斷昇級，將逐步形成承接發達國家重型製造業轉移的條件，在未來 10~15 年內，發達國家的金屬工業、化工工業、機器設備製造業，甚至汽車和飛機製造業等都會大幅度消減國內生產份額，並把這些消減下來的生產能力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所以更大的產業轉移浪潮還在後面，新的全球化格局就會繼續深入發展。

在整個 80 年代，中國的出口產品是以初級產品和輕紡產品為主導，1994 年，機電產品出口比重首次超過了輕紡產品，2006 年，機電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經上昇到 46.5%，加化工產品出口，重化工產品的出口比重已經上昇到 52%，重化工出口產品比重的迅速上昇，與中國的工業化在 90 年代開始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是一致的。但是直到 2005 年，中國的重化工業出口比重仍低於重化工業在工業產出中 69% 的比重，而在進口結構中，重化工業產品的比重仍超過 70%，說明中國的重化工業在產品品種、質量和技術水平方面仍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重工業進口替代的過程還沒有走完。此外，雖然重化工產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經超過 50%，但還有大量產品是消費類產品，與發達國家以生產資料類產品為主要出口產品的結構，差距仍是很明顯的。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中國重化工產品出口比重上昇的空間是巨大的。

在目前發達國家的八億人口和四億勞動力中，製造業部門的勞動力約有八千萬，總產出約十萬億美元。而中國不僅目前仍有約兩億左右的龐大剩餘勞動力，到 2030 年人口高峰時，還會增加一億左右的新勞動力，所以完全可以承接發達國家未來巨大的產業轉移

規模。當然不會是所有發達國家的產業外移都指向中國，但以中國穩定的政治體制、完善的基礎設施、發達的製造業體系，和價格低廉且素質優秀的勞動力，在世界發展中國家中佔有明顯的優勢地位，未來階段發達國家重工業轉移的指向地肯定首先是中國，從而使中國在未來真正獲得新“世界工廠”的地位。

如果發達國家在未來 25 年將把三分之二的製造業生產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並有年均 2.5% 的製造業產品需求增長規模，到 2030 年就會形成超過 12 萬億美元的進口需求，如果其中 40% 指向中國，則加中國目前的出口規模，到 2030 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就可超過五萬億美元，這對於二萬億美元的初級產品進口需求來說，已經足夠了。由於到“十二五”後期中國將通過逐步理順國內的收入分配關係來提昇內需水平，反映到進出口方面就是進口速度會逐步提昇，到 2030 年也將逐步達到貿易平衡，所以到 2030 年進口總額也將上昇到五萬億美元，貿易總額則將可能在 2030 年達到十萬億美元。

由於目前發達國家的製造業資本總額約有八萬億美元，如果其中的三分之二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所吸納的發達國家產業資本也可能超過二萬億美元，25 年平均，每年約八百億美元，加上吸納的其他類型國際投資，中國未來 25 年平均每年吸收的國際直接投資將可能超過一千億美元，也就是說，中國利用外資額的年均水平在未來還有可能上昇。

當 1987 年我提出“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的時候曾設想，到 2000 年中國的出口可達到 1500 億美元，這個戰略目標設想曾被許多人認為根本不可能，然而到 1995 年中國的出口總值就基本上達到這個目標了（當年出口額為 1487 億美元）。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祇要新全球化格局進一步發展，祇要在未來長時期內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仍存在巨大差距，中國的貿易額和貿易順差

額就會不斷增長。由於中國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更明顯的競爭優勢，中國也許會在未來新全球化格局中爭取到更多的國際投資和貿易份額，因此預測中國的貿易額在未來 25 年內達到十萬億美元，並爭取到 2.5 萬億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份額，可能還是比較保守了。

四、到 2030 年新對外開放戰略 的主要戰略目標設想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已經可以為中國的新對外開放戰略描述出一個基本框架：

（一）戰略重點

在經濟發展方面，重點是通過不斷擴大的出口規模，為國內的工業化建設換取必須的各類初級產品；

在經濟體制方面，重點是在 2015 年以前通過貿易順差的擴大吸納國內的過剩資本與生產能力，以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連續性與社會穩定，避免中國經濟出現“大起大落”。

（二）主要戰略目標

到 2030 年中國的貿易總額達到十萬億美元，其中出口五萬億美元，進口五萬億美元，貿易總額的年均增長率為 8%；

如果世界貿易額在未來 25 年內以年均 7% 速度增長，則到 2030 年中國的貿易比重將接近 20%；

未來 25 年累計利用外資額為 2.5 萬億美元，平均每年超過一

千億美元；

到 2030 年在出口總額中，重化工業產品比重將超過 75%，約比目前提昇 20 個百分點，在進口總額中初級產品比重將上昇到 75%，約比目前提高 53 個百分點。

(三) 戰略發展階段

未來 15~20 年將可能是發達國家重化工業轉移的高峰期，中國要為迎接發達國家重化工產業資本向中國的轉移以及重化工產品出口的快速增長做好準備。

由於到 2015 年以前中國還不可能轉向貿易平衡，而仍具有擴大貿易順差的趨勢，中國政府在處理貿易摩擦和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方面，要準備應付更尖銳複雜的局面。

五、新對外開放戰略需要研究的幾個政策性問題

新對外開放戰略需要具體化為許多相關的政策，在這一部分我們將討論與政策相關的一些認識問題，因為祇有澄清了某些模糊認識才能制定出正確的政策。

(一) 怎樣看待貿易依存度問題

2006 年，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超過了 67%，其中出口依存度已經超過了 37%。這樣高的貿易依存度在世界各大國的歷史上都沒有出現過，例如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日、德三國，目前祇有德國的出口依存度超過了 30%，日本和美國都在 10% 上下，日本

在出口依存度最高時也不過 16%，美國則從未超過 12%，因此許多人認為中國已經不應該繼續允許貿易依存度的上昇了。

如果未來 25 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為 7.5%，貿易增長率平均為 8%，則中國的貿易依存度肯定還會繼續上昇，到 2030 年可能會上昇到 72% 以上，這樣的戰略目標設計是否有問題呢？

當我們討論中國貿易依存度的時候必須看一個新現象，就是發展中國家出口增長動力源的變化。自 20 世紀 60~80 年代東亞地區相繼出現經濟“起飛”的各經濟體，雖然都是靠出口高速增長帶動工業化加速，但外資企業在出口中的比重都不高。例如日本在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可在出口中外資企業的比重幾乎等於“零”；“亞洲四小”在 70 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外資出口比重不超過 8%；而東南亞“五小虎”在 80 年代開始經濟起飛，外資企業出口比重僅佔到 20%。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外資企業已經成為中國出口迅猛增長的主要的推動力，到 2005 年，外資企業出口比重已經達到 58.3%。如果不是在“冷戰”結束後出現了新的全球化浪潮，發達國家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形成了巨浪，在中國也不會出現自 90 年代初以來一直持續到今天的出口高增長，因此，絕不能用所謂的歷史規律來硬套中國今天的現實，祇進行籠統的比較就提出中國貿易依存度過高的結論，而是應該依據國際經濟環境已經深刻改變的客觀現實，來重新認識與設計中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否則就會痛失掉促進中國加快工業化速度的最有利國際機遇。

（二）怎樣看待利用外資規模問題

據商務部《2004 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目前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中，跨國公司子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已佔據

國內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場份額，在有些產業領域甚至超過了90%，在東南沿海地區的某些產業領域，外資企業已經形成了閉環的產業鏈條。在當前討論有關利用外資積極意義的時候，許多人似乎僅認為外資對促進中國就業有作用，而在經濟安全、技術創新、民族工業發展等諸方面，外資都已不具有積極作用了，在保護環境和抑制國內資產泡沫方面，外資甚至發揮了極為負面的影響。由於中國目前已經開始出現龐大的資本剩餘，許多人認為目前已經到需要限制利用外資規模的時候了。

任何事情都有兩個方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而政策制定者的責任，是必須分清楚在一個事情中是好的一面大還是壞的一面大，權衡利弊才有正確的取捨。中國在資本方面雖然已經可以不依賴外資，但是在仍與發達國家存在很大科技與技術水平差距的階段，祇要擴大引進的外資是帶有高技術含量的，從總體來說對中國就是有利的一面大。

前面的分析已經說明，由於新的全球化格局仍會繼續深入發展，發達國家下一步產業轉移的重點將集中到重化工業方面，而重化工業不僅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更是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繼續鼓勵擴大外資流入所獲得的利益，將會通過中國重化工業獲得更快的產業結構昇級速度，更快地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差距等方面展現出來。反之，中國如果不抓住這個機遇，就會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所獲得，中國就會在新全球化的增長格局中落後、掉隊。

外資流入擴大的確會對中國的許多重要產業領域形成控制甚至壟斷，但首先是要看這些生產能力是否可以被中國的經濟發展所利用，為充實中國的國家經濟實力作出貢獻。從改革開放以來轉移到中國的外資企業實際情況看，這些外資企業一般都會是先滿足了

中國國內的需求，多出部分才拿來出口，有些行業中的外資企業目前外銷比率很高，但首要原因不是不願意擴大內銷比重，而是在現階段中國的內需還吸納不了，隨著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外資企業的內外銷比率也會發生改變，也有許多外資企業原本就是奔著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需求來的，這就是一個推動中國產出增長與滿足國內需求增長的過程。日本和“亞洲四小”在經濟起飛過程中的所謂“高速增長期”一般祇能持續十年左右，但中國從 1978 年至今，已經創造出持續 28 年高增長的世界奇蹟，其中不僅有改革開放的功勞，也是國際產業資本的轉移改變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週期。所以祇要流入中國的外資可以服務於中國的供給與需求增長，儘管會在許多領域取得壟斷地位，仍是積極的一面大。

從另一方面看，由於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外移，已經導致了發達國家製造業增長速度的長期下降趨勢，以美國為例，製造業佔 GDP 的比重 1990 年還高達 25%，目前已經下降到 13%，新世紀以來，美國製造業的年均增長率還不到 1%，所以從總體上看，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首先是改變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對比關係，對發展中國家是有利的。

此外，由於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科技人才的工資水平，一般要比發達國家低 80%，這樣就吸引了發達國家逐漸把研發中心也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科技人才得以迅速成長和擴大。外資企業雖然可以不斷擴大在中國的產業領域，但人才是可以流動的，這樣就為中國本土企業在未來的發展準備了人力資源條件。

（三）怎樣看待引進技術與自主創新的關係問題

許多人擔心，中國不斷擴大利用外資規模，會形成對發達國家

的技術引進依賴，從而不僅會阻礙本國的技術創新，還會由於發達國家對技術轉移的限制，使中國的技術進步永遠落在發達國家的後面，甚至使國家安全失去保障。

從科技進步看，物質產業的發展才是推動科技發展的強大動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物質產業發展失去了比較優勢，已經被迫走上了祇能以金融產品與發展中國家的物質產品相交換才能生存的“虛擬資本主義”道路，科技發展的速度因此而顯著緩慢下來。例如，美國最近幾年的 GDP 增長中，有超過 50% 是被房地產業拉動的，而在房地產業中，即便是建築 5A 級的高智能化寫字樓，其科技含量也不超過 15%，所以美國的許多精英人士都在擔心，由於美國物質產業發展的“空心化”，將會導致美國科技發展也停滯。2004 年由戴爾、惠普等美國高科技大公司提供的一份報告說明，過去 20 年裡，美國在全球高科技出口中所佔的比例從 31% 迅速降低到 18%。與此同時，中國、韓國和其它亞洲新興國家的高科技出口在全球出口中所佔的比例則從 7% 上昇到了 25%。1989~2001 年裡，美國的高科技產出祇增加了一倍，但是中國的高科技產出卻上昇了八倍多。報告還指出，美國培養的理工科人才也落在了亞洲國家後面。以 2000 年為例，亞洲國家的大學頒發了大約 120 萬份理工科的畢業證書，而北美洲的大學祇頒發了大約 50 萬份畢業證書。人才培養速度的緩慢已直接影響到美國在理工科研究領域內的新發現。報告說，在 1988~2001 年期間，美國發表的理工科論文祇增加了 13%；而包括中國、新加坡、臺灣和韓國在內的東亞國家則增加了 492%。此外，亞洲新興經濟體投入研究的資金也直追美國。報告說，在 1995~2001 年期間，中國、韓國和臺灣的研究投資增加了 140%，而美國祇增加了 34%。

直到 2004 年美國的海外投資年收益仍然是正值，但當年美國

的海外投資總額已經比外國投資到美國的投資總額少了三萬億美元。美國許多精英人士曾據此驕傲地說，這是因為美國的科學技術發達，知識產權的回報率高，但是 2005 年美國的海外投資收益卻首次出現了逆差，說明美國的科技進步速度與輸出知識產權的能力已經開始萎縮了。種種跡象說明，美國在科技創新領域內保持了半個多世紀的領先地位，如今已經開始動搖了。

反觀中國，目前正處在工業化中最艱難的“爬坡”階段，從長期看，國內能源、礦產和主要農產品都存在著巨大的供給缺口，也不可能永遠靠從國際市場進口滿足需求。發達國家以佔世界 13% 的人口規模，卻消耗了超過世界三分之二的能源與礦產資源，對中國和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果也走發達國家傳統工業化的老路，把完成工業化任務建立在石油、煤炭和鋼鐵等傳統能源與原材料上，根據世界現有的資源供給可能計算，大約祇能維持 30~40 年，而且會面臨著劇烈攀升的資源產品價格與巨大的環境壓力。這就逼迫中國人必須依靠自己的勤勞智慧，向科技進步要發展空間，走出一條不同於傳統工業化道路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從而成為推動中國科學與技術發展的強大動力，並會據此佔領世界科技進步的巔峰。

1994 年，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第一次超過輕紡產品，成為第一大出口產品，十年後中國機電產品貿易首次出現了 156.7 億美元的順差，2006 年前 11 個月則猛增到 623.3 億美元，增長了三倍。在 2005 年中美貿易中，按美方統計為中方順差 2020 億美元，在中美貿易所涉及的 98 大類產品中，75 類工業製成品都是中方順差，其中不僅有消費品，機器設備和高科技產品也佔有相當大的份額，23 類初級產品則主要是美方順差。從這些變化不難看出，主要由重工業部門提供的機電產品，不僅已在很多領域能滿足我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能以強大的競爭力不斷開拓海外市場，而美國等發達

國家在重工業產品方面，卻越來越依靠從中國的進口。

可以預計，在新的全球化時代，技術創新的中心將逐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所以，擔心繼續擴大引進外資規模會阻礙中國的技術進步，是沒有根據的。

（四）怎樣看待要素成本上昇與中國的競爭力問題

進入 21 世紀以來隨著中國進入新的經濟增長繁榮期，中國的各种生產要素價格水平都出現明顯上漲，這是否會使中國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逐步喪失長期以來的競爭優勢呢？

從工資成本的競爭優勢看，中國還可以保持 20 多年，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二元”結構特徵直到今天仍沒有從根本上消除，從城鄉收入差距看甚至比 80 年代有所強化，而徹底消除中國的二元結構特徵，恐怕需要 30 年乃至更長時間。二元結構使中國在今後長期內仍然會擁有龐大的農村勞動力剩餘，這樣就會對中國的工資水平形成長期的壓抑，從而使中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保持著長期的工資成本競爭力。

中國的競爭優勢也產生於區域的二元結構，即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區域發展差距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由於中國地域遼闊，東、西部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距較大，在沿海地區要素價格上昇後，企業還可以向內地要素價格低的廣闊區域轉移，一些小國則沒有這個條件，所以相對於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國沿海地區在要素價格上昇推動下產業結構昇級後，低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向內地轉移，仍可以保持競爭優勢。

從土地資源條件看，根據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為國家發改委“十一五”規劃所做的一項研究，如果到 2030 年中國的糧食進

口規模保持在五千萬噸，國內耕地的單產提高速度保持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水平，則在目前的 18 億畝耕地資源中，還可以拿出 1.5 億畝來轉移到非農產業發展，平均到 25 年中每年約六百萬畝，比改革開放以來年均耕地轉移規模還要高，因此土地供應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從產業競爭能力看，中國的競爭優勢更明顯。因為下一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會向重化工產業集中，而重工業的產業鏈條很長，發達國家祇能首先轉移重工製造產業中某一個或某幾個生產環節，這就需要接受轉移的國家必須具備良好重工業基礎和很強的配套能力，以及素質優秀的技術工人。以機器和運輸設備佔全部製造業產出比重來比較幾個發展中大國，2001 年中國為 32%，巴西和墨西哥為 27%，印度祇有 19%；以當年該產業的產出規模比較，中國是墨西哥的 4.5 倍，巴西的 7.7 倍，印度的十倍還多；從製造業的工人人數看，印度、巴西和墨西哥都在一千萬人以下，中國則超過了六千萬。所以，由於中國重工產業的發達程度明顯高出其他發展中國家，就必然會成為發達國家重工產業轉移的首選地。如果說在接受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國還有一定的競爭力，在接受重工業轉移方面，這些國家的競爭劣勢就太明顯了。

重化工產業是高附加值產業，工人的工資水平比較高，但是由於重化工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高於輕工業，重工業比重的提昇可以帶來工資水平的上昇，從工資佔產值比重看，卻可能是下降的。例如在中國目前的製造業中，機電產業的平均工資水平祇比紡織和服裝產業部門高出 20~50%，但是人均產值卻高出 3~4 倍，所以如果重化工產業轉移成為主導潮流，工資水平的提高也不會對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有太明顯的影響。

(五) 怎樣看待人民幣匯率問題

“八五”時期以來，中國開始形成穩定的貿易順差格局，到“十五”末期，已經累計形成了超過 3800 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其中“十五”時期累計的貿易順差超過了三個五年計劃期間累計順差額的 55%。與此同時，90 年代初以來隨著中國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在資本項下也出現了不斷擴大的順差，這種“雙順差”格局，使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昇值的呼聲不斷高漲，在國內對人民幣匯率的討論中，也有許多人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那麼在新對外開放戰略中應當怎樣安排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呢？

匯率是兩國貨幣的折算率，其基礎是兩國商品價格體系的比較，而各國商品的價格水平，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水平所決定的。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由於冷戰使南北國家的經濟發展長期隔絕，由此形成了南北國家間高達幾十倍的生產要素價格差距，即便是在冷戰結束後開啟了新的全球化時代，但是除了資本要素外，土地與勞動力要素仍不可能自由流動，這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要素價格及其商品價格體系就不可能在短期內迅速拉平，而是會在未來十幾至 20 多年內仍然存在著巨大落差，這個高達幾十倍的價格體系落差不是簡單地調整匯率就可以校正的。

國外經常以人民幣低估來作為要求人民幣昇值的理由，但是從理論角度看，貨幣的對應物是商品，商品的價值不提昇，貨幣的升值就沒有根據。舉例來說，在目前的中國，一畝土地用在農業生產方面，其價值祇能以數百元計，但是若轉移到工、商業用途，其價值則會上昇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是因為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在工商業領域所獲得的產出價值，可以比農業高出幾十乃至上百倍。同理，一個勞動力如果從事農業生產，一年所創造的價值祇有千元左右，

而轉為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則可以創造出萬元以上的價值，所以當工業化過程中大量生產要素從低報酬率的部門向高報酬率的部門轉移時，就會導致各種生產要素的價值普遍提昇，從而抬高了本國貨幣所包含的價值，這就是本幣昇值的依據，這也是為什麼各工業化國家都是在基本上完成工業化任務的時候，本幣才會出現較大幅度提昇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中國的地價和勞動力價格都上昇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人民幣就有充足的理由升值，反之，在中國直到目前還有 60% 的農村人口，工業化剛剛進入到中期階段的時候，硬要中國脫離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通過本幣升值來提高本國的要素價值，才真正是對人民幣的高估。

從發達國家角度看，要求人民幣升值也不符合本國的最大利益。由於在新的全球化時代，一種完全相同的產品可以在兩個存在著巨大價格落差的經濟體系中生產和採購，發達國家如果仍然把生產和採購放在國內，就必然要支付高昂的成本和損失巨大的利潤，放到發展中國家生產和採購則可以大幅度降低成本和獲得巨大利潤，因此發展中國家的幣值上昇就會導致發達國家的利益損失，這是已經進行了產業資本轉移的發達國家企業所不願意看到的，也是已經從發展中國家進行大量採購和銷售中獲利的貿易、流通商所不願意看到的。在新全球化格局中真正受損的是沒有能力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產業和採購轉移的中、小製造商與流通商，以及部分失去工資崗位的產業工人，而他們實際上也已經從享受低價進口產品中獲益。所以，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雖然一直不斷，但由於受到新全球化利益的左右，結局仍然會是“雷聲大、雨點小”，並不是真想通過壓迫人民幣升值來解決貿易平衡問題。

由於在今後長期內並不存在著對人民幣的真實壓力，人民幣昇值的過程還是要與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同步，具體說就是要保持在真

實換匯成本的水平上就可以了。

（六）怎樣看待未來十年貿易順差擴大問題

中國的收入分配矛盾需要通過擴大外需來緩解，而且新的全球化格局也提供了這種可能，但還需要研究有關問題。

一個問題是，貿易順差需要擴大到何種規模才對緩解國內淨儲蓄過度增長為有利。中國淨儲蓄過剩的一個表現是國內銀行體系的“存差”，1999年中國的存差額首次突破1.5萬億元，到2006年末則突破了11萬億元，其中2001~2003年之間年均增加為9700億元，2004年增加了1.4萬億元，2005年增加了2.9萬億元，2006年增加了1.75萬億元。與此相對應，這三年累計的貿易順差祇有2.5萬億元人民幣，僅相當於當年國內新增淨儲蓄的40%，所以國內商品過剩的矛盾還是很明顯。如果接近五年銀行存差增長的速度計算，到2015年當年新增存差總額可能會增加到超過30萬億元人民幣，按目前匯率折算就是超過三萬億美元，即使按目前順差佔國內當年新增淨儲蓄的40%計算，也應該形成一萬億美元以上的貿易順差。當然在未來十年通過各種擴大國內消費的政策，國內淨儲蓄的形成速度也會有所減緩，甚至可能是明顯減緩，但仍然有可能超過十萬億元的年新增額，因此要求到2015年貿易順差額增長到三千億美元，並不是一個很不切實際的目標，也與目前外需緩解國內過剩矛盾的程度相同，如果2015年當年新增存差真的突破了十萬億元，實際上當年中國貿易順差額超過五千億美元才會更理想。

另一個問題是，在當今世界祇有德國的貿易順差總額達到過1500億美元，未來十年中國的順差額達到3000億美元，這個目標是否太高了呢？必須看到，中國的人口規模15倍於德國，日本與

德國在二戰後的出口高峰，人均出口額都曾達到八千美元以上，人均貿易順差額都曾達到 1500 美元以上。按此計算，以 2015 年中國人口 14 億計，僅貿易順差額就可以超過二萬億美元，要求到 2015 年中國的貿易順差額達到三千億美元又有什麼了不得的呢？

（七）怎樣看待外匯儲備規模問題

貿易順差擴大加可能會增多的國際投資流入，會不斷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一，如果到 2015 年前中國的年貿易順差額會增加到三千億美元，年利用外資額平均達到一千億美元，則僅由於這兩個原因，未來十年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就可能新增 2.5 萬億美元，加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和部分“熱錢”流入，未來十年外匯儲備規模可能上昇到超過四萬億美元，這已經基本等同於目前全世界的外匯儲備總額了。

在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動蕩不定的形勢下，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規模必然會招致極大的風險，因此必須從兩個方面考慮化解風險的辦法。

首先是應調整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過於集中在美元，而美元正在累積著越來越高的風險。外匯資產與其他資產的不同之處是，外匯是一種“平衡資產”，即對於國際主要貨幣來說，這種貨幣漲了，必然是另一種貨幣降了，所以祇要貨幣儲備的籃子比較均衡，一般來說就可以避免貨幣匯率變動的損失。而證券、房地產等資產形態，則具有同昇同降的性質，無法通過建立對沖機制來避險。

另一個辦法是儘快建立中國的石油、貴金屬和其他重要礦產資源的戰略儲備，並且鼓勵中國企業到境外大規模購買關係中國經濟

發展的重要戰略性資源，例如油田和礦山等。中國從 90 年代中期以來，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的特徵越來越明顯，由於天然稟賦的資源不足，中國也越來越加深依賴國際資源，例如石油和鐵礦石等的國際依賴率都已達到 40~50%，這樣當國際社會發生任何動蕩的時候，必然會明顯影響到中國的物質生產供應鏈，但是我國直到最近才提出建立石油戰略儲備的任務，初步的目標是建立大約一週左右的戰略儲備油，與發達國家目前已經建立的三個月以上的戰略儲備油規模相差甚遠，而建立其他重要礦產儲備的任務直到目前也沒有被提出來，這無疑大大增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不安全性。我們一方面擁有巨大的外匯儲備資產，一方面又急需建立各種重要的資源儲備，完全應該也有條件加快建立戰略儲備資源和推動企業到海外收購的工作。

必須認識清楚一個問題，就是國家儲備的形式絕不祇是一個，實物儲備形式也是重要的儲備形式。中國由於貿易順差擴大和大量吸納外資會形成大量外匯收入，但是把這些外匯收入是用於增加外匯儲備，還是用於增加實物儲備，是中國政府可以選擇的。中國過去外匯儲備不多，為保持國際收支平衡與人民幣的穩定，適當增加外匯規模是必須的，但是按照國際慣例，擁有大約相當於三個月的進口規模就可以了，擁有滿足六個月進口的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足夠了，按照滿足六個月進口的標準，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 1995 年就達到了，而到 2006 年 3 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相當於 15 個月的進口額，實在是太大了，但重要戰略資源的實物儲備規模以石油來說，卻連國際公認標準的 10% 都不到，又實在是太小了，所以，儘快轉換中國儲備的形態，實在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

還應該看到，由於自 1971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來，貨幣脫離物質產品的生產與流通急劇膨脹，已經醞釀成巨大的貨幣

泡沫，遲早會通過國際金融體系危機的爆發，引起嚴重的全球通貨膨脹，因此即便可以通過調整外匯儲備的幣種結構來化解匯率的風險，但還是不能避免國際貨幣泡沫破滅時龐大外匯儲備對實物劇烈貶值的風險，這就更突出了儘早把貨幣資產大量轉化成實物資產的必要性。

（八）對外開放的區域戰略問題

對戰略而言，不僅要有產業重點，也要有區域重點，中國的對外開放就是首先選擇了廣東、福建兩省與四個經濟特區為突破口，再向全國逐步展開的。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新的對外開放戰略也需要選好區域的突破口。

在 90 年代初期中國成功實施浦東開放戰略後，到 90 年代後期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本屆政府首先提出了東北振興的區域戰略，接著提出了中部崛起戰略，最近又把區域發展的重點轉到了天津濱海新區，目的也是想找到一個區域戰略的突破點。

前面的分析已經指出，在新全球化格局的發展中，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後續重點將是重工產業，這將會導致發展中國家承接的國際投資和出口增長都會向重工產業轉移，而對中國來說，重工業基礎最發達，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東北三省，因此新對外開放戰略的區域重點應該選擇東北。

客觀的說，東北振興戰略提出以來，直到目前還沒有看出顯著效果，總結其中的原因，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外開放度沒能明顯提高，而中國 28 年的改革開放歷史證明，沒有對外開放的促進，經濟是不可能出現高速發展局面的。2000~2005 年，全國進出口額對 GDP 的比率從 39.6% 上昇到 64.1%，上昇了 24.5 個百分點，東北

三省同期從 23% 上昇到 31%，雖然也有上昇，但還低於全國五年前的平均水平。

東北經濟發展落後的原因，除了對外開放度不高以外，根本原因是當地特別強烈的“二元”經濟結構，使當地高度發達的重工業體系無法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融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重工業是直接為住房、汽車等高檔耐用消費品服務的，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就需要與一個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對應，否則就沒有良好的發展空間。改革前 30 年，東北地區的重工業是為“準備打仗”服務的，可以不依託本地市場需求就獲得發展，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引入了市場機制，工業產出必須與市場需求相對稱，東北地區的重工業與本地市場需求嚴重脫節的矛盾就開始突出了。因為無論從重工業佔工業產出比重看，還是從城市化率看，東北地區都是全國最高的，但是除遼寧的人均 GDP 可以進入全國前八位之外，吉、黑兩省都處在全國的中位。由於東北地區的重工業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錯位，產出無法被當地的需求充分吸納，祇能走過去以全國市場需求拉動重工業增長的老路子，但是全國其他地區，特別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由於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或是通過技術引進發展了本地的重工業，或是通過貿易獲得了國外先進的重工業產品，這樣就逐漸排擠了東北地區重工業產品的市場。而在東北地區，重工業受到外部市場限制，發展速度緩慢，本地輕工業本來就不發達，產品市場也逐步被外地產品佔領，經濟增長速度當然會長期落後。

走出東北振興之路還是要靠對外開放。在外部，發達國家轉移重化工業的浪潮正在興起，在中國內部，東北地區重工業的基礎是相對最好的。東北地區的重工業雖然缺乏本地市場，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卻可以靠外部國際市場對重化工業的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也可以靠引進發達國家的重工產業資本轉移，來完成對本地區

重工業技術基礎的改造與昇級，從而走出一條振興東北經濟的新路子。東北地區通過對外開放實現新的振興，也將使中國的經濟發達地帶在沿海地區從南到北連成一片，使中國的對外開放出現新的區域經濟格局。

東北三省除遼寧有發達的出海口外，吉、黑兩省都不能直接出海，這是東北通過擴大開放實現經濟振興的重要障礙。從琿春地區打開吉、黑兩省出海通道的構想已經議論了多年，許多國際機構也在大力推動，但進展不大。如果能把東北定為新對外開放戰略的重點地區，這個問題就必須放到戰略重點的地位加緊解決。

（九）對外開放新階段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新對外開放戰略要求中國經濟要更深地融入到國際分工體系之中，特別是要不斷加深對海外資源的依賴，這是否會對中國的經濟安全造成新威脅？這個問題還要從新全球化格局的特點來回答。

前面對新全球化格局產生原因的分析說明，在當今時代由於發達國家的物質產業已經喪失了全球的比較優勢，將會不斷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物質產品供應的依賴，從這個意義上講，發達國家的生存形態已經發生了質變。擁有世界霸權的大國當然不願意看到中國經濟的崛起，但是新的全球化格局框架下，祇有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物質生產能力增長，發達國家的物質產品消費才能增加，反之，如果中國的海外資源產品供應鏈斷裂，也等同於發達國家要失去物質產品供應的保障，因此這種依賴發展中國家物質生產的格局，就是中國最好的國際安全保證，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物質產品供應依賴越深，中國的國際安全保障度就會越高。所以，在國際經濟格局已經並仍在發生劇烈改變的新時代，要有新的國家經濟安全觀。

（十）新對外開放戰略與外交戰略的關係問題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外交戰略已經經歷過兩次轉型。第一次是在改革開放之前，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把外交工作的重點從以前蘇聯為主的東方國家，轉向第三世界國家。第二次外交戰略轉型就是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對外開放政策，向西方發達國家敞開了中國的大門。這兩次外交戰略轉型，都高瞻遠矚，適應了當時中國的戰略與發展需要。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需要提出新的對外開放戰略，也需要與之配套的新的外交戰略。

從總的變化方向講，西方國家將會不斷加深對中國生產的依賴，特別是在進入到發達國家對中國進行大規模重工產業資本轉移後，這種依賴會更加明顯，這會使中國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外交關係中，逐步取得日益明顯的優勢地位，也會使中國與各發達國家的關係更加友好，也如前所述，取得了某種國際安全保障。

但是，由於中國必須從許多發展中國家取得資源，甚至把超過一半的世界資源，都吸收到中國來使用，同時又承接了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的產業資本的主體和大部分市場需求，這樣就會使多數發展中國家無法與中國一樣，享受新全球化浪潮帶來的好處，從而可能使中國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產生越來越大的經濟發展差距，以及圍繞發展機會產生的越來越多、越來越尖銳的衝突。近十年來，中國所遭遇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調查案件，排在前十位的國家有六個是發展中國家，2005年有18個國家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其中有11個是發展中國家，其中有很多發展中國家與中國還有著很大的貿易順差，發起反傾銷調查的原因，主要是由於中國的某些製造業產品輸入，擠佔了本國製造業的發展空間。

在二戰後所形成的“水平分工圈”與“垂直分工圈”框架內，工業製成品基本是在發達國家內流動，工業原料則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新的全球化浪潮已經改變了原有的國際經濟框架，隨著國際產業資本的轉移，製造業產品開始從發展中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工業原料則開始從部分發展中國家，流向另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在這個全球經濟格局的新變動中，中國由於自身所具備的各種優勢，一方面在不斷吸納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各種工業原料，一方面向發達國家輸出製造業產品，同時還把部分製造業產品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輸出，在某種程度上是重複了二戰後的國際經濟框架，替代了以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雖然獲得經濟發展的新機會，也會因此重複戰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所以，如何處理好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外交關係，是中國在經濟發展新階段所必須慎重對待的新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不僅中國的資源獲得會失去可靠保障，還會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所孤立。因此，新的對外開放戰略，要求中國的外交戰略也必須著眼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需要，做必要的調整，要把與發展中國家的外交關係放到更重要的地位。